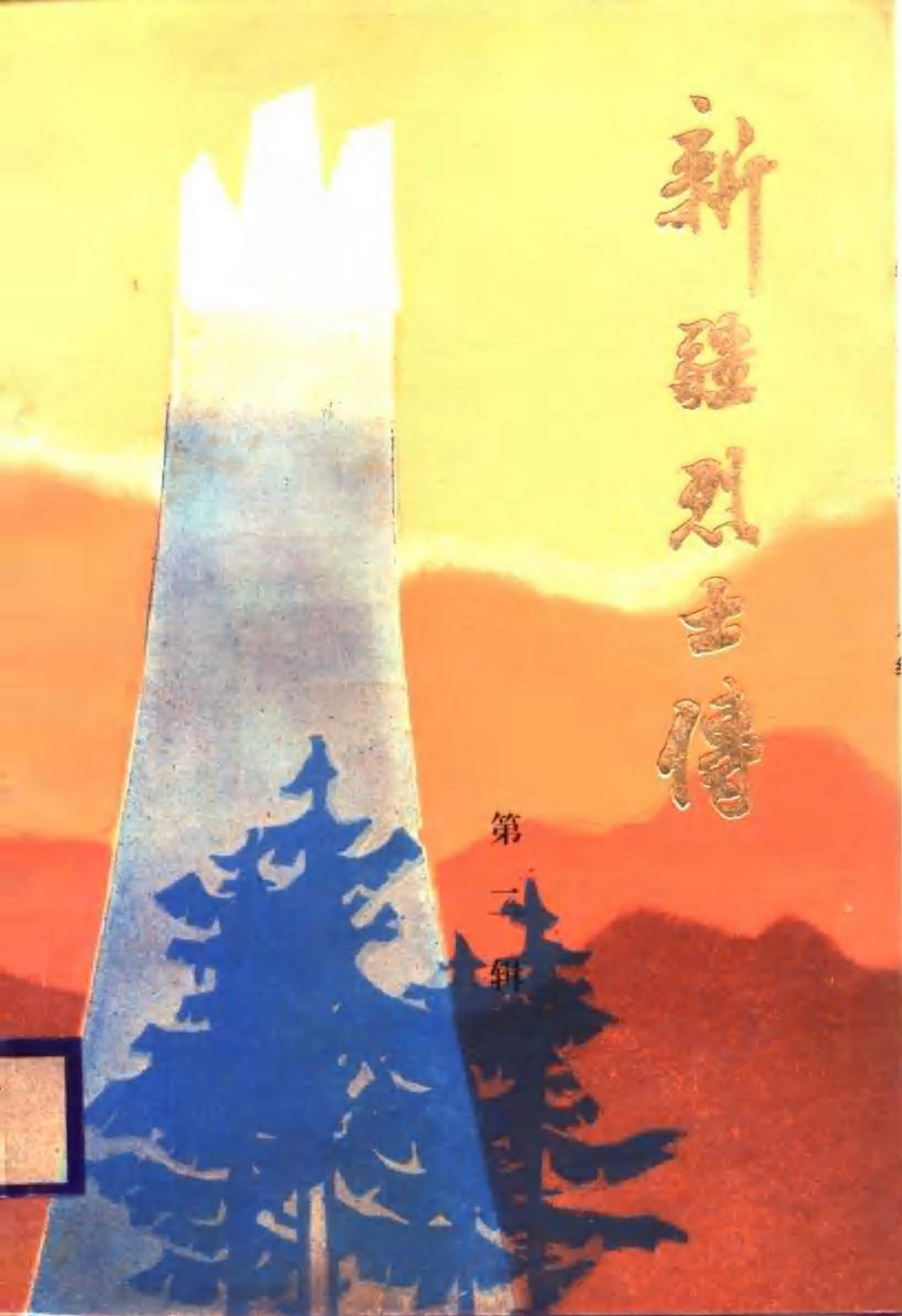


新疆烈士傳

第二輯



新疆烈士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烈士传

第二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6插页14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11098·91 定价：1.75元

繼承先烈遺志
捍衛祖國和平
勞動為建設社會
主義而奮鬥

中央代表團

王震敬書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

天山脚下埋忠骨
英雄业绩传后代

一九八五年九月卅日 王首道

烈士英灵
万古长存

新華日報
一九五二年九月
唐大

前 言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有关规定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象我们的前辈那样，象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新疆烈士传》丛书，本书将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烈士事迹，分别陆续结集出版。在编辑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传以后，我们还将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烈士传。《新疆烈士传》将是褒扬烈士的丰碑，也是祭奠烈士的花环，它使我们有机会缅怀长眠在地下的革命先烈。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史册里，曾有几百万革命者为国家和民族英勇捐躯。在这艰苦而漫长的战斗岁月里，新疆的共产党员、党外革命志士和爱国进步青年，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前仆后继，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立了不朽的业绩，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永垂青史，光照人间，为后人所敬仰。烈士的光辉业绩和伟大精神，是党和人民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对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及道德教育的最好教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好教材，它将永远鼓舞和激励各族人民，沿着革命先烈开辟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产主义远大目

标，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本书所收的烈士传，是生动感人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和爱国进步青年的斗争纪实，也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历史史料。文章均经过党史、社会科学、民政和有关部门专业干部的审定，资料翔实、文字通俗、内容丰富。是集体心血的结晶。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史料遗误之处，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	(1)
——俞秀松烈士传	
革命左派先驱 爱国拥党英烈	(29)
——杜重远烈士传	
百折不挠的钢铁战士	(51)
——乔国桢烈士传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65)
——吴茂林烈士传略	
天山之民	(75)
——祁天民烈士传	
把全部身心献给红军的事业	(91)
——陈振亚烈士传	
革命先锋	(105)
——陈奇烈士传	
战斗英雄 模范团长	(127)
——陈冬尧烈士传	
照亮暗夜的星光	(143)
——黎·穆塔里甫烈士传	
爱国进步青年的优秀代表	(159)
——乔国仁烈士传略	
“光明的路子，我有决心走下去！”	(171)
——田毓桂烈士传略	
编 后	(177)

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

——俞秀松烈士传

俞秀松同志,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是早期进入新疆的共产党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他那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的开拓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一)

俞秀松,原名寿松,字柏青,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又名余寅初,自称长山道人;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名“纳利马诺夫”;在新疆工作时,曾化名王寿成。他一八九九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溪埭村。一九〇八年入本村行余小学,毕业后到临浦高等小学读书。

俞秀松出生的时代,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利用武力长驱直入,霸占了中国的内河航行权、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清廷腐败无能,对外妥协投降,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工具。俞秀松幼年是在旧中国的农村度过的。当时军阀连年混战,农村土地集中,阶级矛盾激化,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

上。俞秀松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和封建势力的巧取豪夺，从小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发愤读书，以期救国。在他上小学时，白天上课，早晚放牛，中午还要割草。有一天下雨，他放牛回来迟了，未赶上上学，便悔恨地揪自己的头发，发誓今后一定要奋发读书。他在上小学时所写的题为《愚公移山论》的作文里，就充满着爱国主义的热情。他写道：“自古成大业者，虽难而不惧，何也？蓄其志坚耳。愚公移山一事，以残年余力而欲移山，其志不可谓不坚乎！”又曰：“吾身虽死，有子在焉。子女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患不平乎！此言足以为法矣！昔高祖之得天下也，困于羽兵，几死鸿门，然卒能帝业，呜乎！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虽强大之国，吾何畏彼哉。”少年时代的俞秀松，已经发出了“中国少年若人人有愚公的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的呐喊，主张要用愚公般的毅力，振兴中华。推翻清廷，救亡图存，是当时一切革命志士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浙江省籍的秋瑾和安徽省籍的徐锡麟的光复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成为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青年景仰崇拜的英雄。俞秀松当然也不例外。辛亥革命时，他年仅十二、三岁，当时他以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政府，就可使中国强大了。他在一篇题为《论游说之士与任侠之士之异点》的作文中，分析了说士与侠士的根本不同点之后，指出：“若夫痛祖国之沦亡，为宗邦图恢复，蓄志十年，发于俄顷，一举而夷虏丧胆，再举而专制革除，三举而共和政府告成。如徐锡麟之于恩铭。周之贞之于凤山，彭家珍之于良弼，岂非轰轰烈烈为世界之大侠士乎？”俞秀松对那些胸怀大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侠士的气节，赞赏不绝，而对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说士，则鄙视已极。然而，辛亥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仍然未使中国国富民强，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

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篡夺，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分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民主共和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却强烈地冲击着每一个爱国青年。少年时代的俞秀松开始思索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认真地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探索。

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曾是清朝最末一代的秀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当过私塾教师和诸暨县劝学所督学、所长。他积极主张推行新文化，认为学新文化乃是救国强民的重要途径之一。俞秀松在其父的影响下，从小勤奋好学。

俞秀松生长在这样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由于有八个兄弟姐妹，生活比较拮据。他接近平民百姓，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对穷人富有同情心。一次，俞秀松和同学们踢球，踢得热了，把衣服脱下。这时，他看到一个小乞丐冻得蜷缩在一旁。便马上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了小乞丐，并且叮嘱弟弟妹妹不要对妈妈说。如果妈妈问起，就说踢球踢热了，衣服脱掉丢失了。俞秀松是长子，父亲为了供他上学，负了许多债。俞秀松十分体会家里的困境，他节衣缩食，放学后便帮家里干活，还开导父亲说：“现在生活困苦不要紧，将来贫富要平等，终有一天人人有工作，大家有饭吃，讨饭佬也有饭吃。”由于俞秀松生活在下层，与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对旧社会的弊端，体会最深，消灭贫困的现象，挖掉苦难的根源，这是他力图变革现实的思想基础。

一九一六年，俞秀松高小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所以投考师范，是“想把中国的教育大大地改造一番”。俞秀松入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积极参加全校师生举行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示威游行。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项条件。紧接着，在日、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袁世凯又复辟了帝制。中国不仅不能外御列强，内建民国，而且陷入了更大的困境。面对祖国的内忧外患，俞秀

松忧心如焚。一天，他和同寝室的学友邵仁，在杭州西湖划船，到了雷峰塔前的月下老人祠堂。只见室内香火萦绕，不少善男信女正顶礼膜拜，他们便与一位香客攀谈起来，这位香客告诉他们：这里的人并不是在烧香拜佛，而是在纪念牺牲的先烈。这个祠堂是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前为了推翻满清王朝秘密聚会的地方。辛亥革命烈士秋瑾，一九〇七年起义失败后，被杀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而她的同志、光复会会员王金发，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曾把杀害秋瑾的凶手，浙江绍兴大地主章介眉逮捕，表示要为秋瑾报仇。但后来却以章介眉捐献田产而尽释前嫌，居然开释。章介眉还当上了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至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介眉卷土重来，不仅索回全部田产，还参与谋划杀害了王金发。言谈间，这位香客拿出一张王金发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枪杀后横躺在草丛中的照片。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俞秀松和邵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虽然他们的心情格外沉重，但悲痛却激起强烈的愤慨和深刻的思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应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如何从中寻找出中国的出路，成为俞秀松苦思冥想的问题。

俞秀松在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以后，眼界大开，耳目一新。浙江一师在当时是南方传播新文化思想的阵地，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遥相呼应。这个学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一些进步教师，如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提倡白话文，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自由平等。特别是校长经亨颐，留学日本，强调“人格教育”，很重视教师质量。在他的倡导下，一师有良好的校风，讲求学术，探索真理的空气浓厚，因而学生思想活跃，自由探讨，出刊物，写文章，各种思潮，各种学派交相论争。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大钊等创办的《晨钟报》、《每周评论》等，

都成为俞秀松汲取新思想的源泉。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象一声春雷惊醒了正处于茫然状态的俞秀松。使他认识到：俄国的十月革命，是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向全人类展示了奔向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这对于正在热烈追求救国真理的俞秀松来说，感到特别亲切和向往，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苦苦思索的答案。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去，“以弥补我的知识荒。”他这里所说的“知识”，显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合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真理。果然，他后来两次到苏联学习，先后长达十余年，实现了早年的愿望。

俞秀松在浙江一师学习期间，博览群书，除了阅读进步报刊外，还从《进化》、《民声》、《自由录》、《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等书刊中，受到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俞秀松虽公开宣称“相信社会主义”，但在其思想上又明显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说：“二十世纪是平民世纪，是劳力劳心遂笑是人，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能生活。”还说：“现在打破家族制度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家族制度，儿是绝对主张打破的，但是打破家族制度，就丢弃父母而不顾养，这是几个人万万不忍出此的。”这时他要把家族、家庭的偶像完全打破。他还自称是“要做我自己的人”、“做个真正的人”、“我是世界的人，决不是什么浙江、什么诸暨，什么人底人。身到那里，就算那里人了。”由此可见，俞秀松在开始接触外来的各种新思潮时，有马克思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有空想社会主义，但他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比较多。

俞秀松在学习期间，求知欲高，他善于学习，善于思考，无论对于什么问题都要深究到底，不搞个水落石出不罢休。于是同

学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三W主义”（即英语中的谁、为什么、怎么样），在同学中以善辩著称。一九一八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俞秀松邀集了十多个同学，在自习室里练习演讲。他的同班同学赵并欢，以“失败乃成功之母”为题发表演说。俞秀松第二天找到赵并欢说：你这句话，对我有很大启发，这就是我以后做人之座右铭。俞秀松的政治见解，用他自己的话说，总“想急进一点”。经常有同学找他辩论，他在同学中传播新思想，是起了作用的。俞秀松在校时，与朱赞唐等被同学称为“道学先生”。他们把“挽回世道人心为己任，把一切的私念都丢开”。每天吃过晚饭后，他便邀集施存统等五、六个人，到校园里散步。在甬道的两旁，在梧桐树下，在经亨颐校长手书的爨（Cuàn）宝子碑前，或在校园后面的明远亭里，都可听到他们十分激烈的争论。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讨论反帝救国，讨论改造社会。一次，在讨论“中国人为什么受人欺凌”和“怎样不受人欺凌”时，“读书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众说纷纭。大家都同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是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但怎样革命呢？有人主张改良主义，有人主张采取和平手段。俞秀松极力主张：要想拯救中国，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因为掌权者从来不会拱手交权的。俞秀松这时已初步懂得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道理，但中国革命究竟应取什么方式和步骤，俞秀松这时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俞秀松在接受革命思想以后，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身体力行。他在滴水成冰的寒冬，也总是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擦身。他说：“我的志愿，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所以我必须把身体锻炼好。到最冷的地方去就不怕冷，到最热的地方去就不怕热，能够愉快地胜任工作。世界上没有难事，一切都是锻炼出来的。‘久炼成钢’，我要把身心锻炼得同钢

铁一样，就会无往而不胜。”

一九一九年，俞秀松在寒假过后，离家回杭州。那天，他的大弟俞寿乔送他去山环埠乘船。路上，俞秀松对他大弟说：“我的志愿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我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一定。父母年纪大了，弟弟妹妹还小，你是家里唯一主要劳动力，田里活全靠你。你的担子不轻。你要争做‘百姓’，千万不能做游手好闲的‘吃姓’，我在外也放心了。”临上船时，又对弟弟说：“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你要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船开得远了，只见俞秀松站在船头频频招手。然而，俞秀松从此以后，再没有回过家乡。

(二)

俞秀松回到杭州，为了进一步探索革命的真理，他刻苦攻读，孜孜以求，把读书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杭州，打破了杭州长期的沉寂状态。在俞秀松、宣中华等人的领导下，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纷纷罢课、游行、检查和烧毁日货。俞秀松组织并率领宣传队，到各闹市区去宣传、演讲。大家手拿小旗，上书“还我青岛！”、“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等口号。向群众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和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内容。提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洗刷国耻的具体办法。最后，俞秀松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小的东洋欺侮得够苦了，卖国贼帮助东洋帝国主义订立二十一条来害我们，现在又侵略我们的山东，不久就会象朝鲜一样，把我们中国吞併了去，我们一定要外争国

权，内惩国贼。”一席话，讲得群情激奋，热烈鼓掌，并跟着俞秀松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卖东洋货！”等口号。

为了进一步宣传反日爱国的思想，从八月下旬起，俞秀松、宣中华等为发起人，邀集各校进步同学二十多人，出版了《双十》周刊，后改名为《浙江新潮》。俞秀松是《浙江新潮》的主编，他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公开宣布办刊的“四种旨趣”：“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从这篇发刊词可以看出，俞秀松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从民族、民主革命前进了一步，开始认识到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到劳动阶级身上，而“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俞秀松所写的这篇发刊词，在刊物同人会上宣读后，获得一致赞成。在第一期上，还转载了日本《赤》杂志的一幅“社会新路线图”，指示了新社会改造的方向，即从革命、解放到共产的一条路线。由此可见俞秀松的思想已明显地转向马克思主义了。

正在这时，俞秀松为了反抗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决定出走。当他看到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所写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又在报刊上看到北京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的积极支持与赞助的消息后，遂于一九一九年底赴北京，去寻求“社会主义”的生活。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他正式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从此，开始了工读生活。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出现，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改造社会的一种尝试，企图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实行一种新的生活，这有其进步的一面，即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否